

白皮書全面體現鄧小平「一國兩制」構想

紀念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談話發表3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天，是已故國家領導人、「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小平發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談話的30周年。鄧公在談話中強調了「一國」的主體，就是實行社會主義的內地，提出了香港特區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的原則和標準等。鄧公提出的原則方針，通過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具體在香港實踐。

今年是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的關鍵時刻，反對派鼓吹不符基本法的「公民提名」，更試圖突破特首須愛國愛港者出任的普選底線。國務院《「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回顧了中央政府按照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順利實現香港回歸的歷史進程，總結了17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其中強調了「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治港者必須愛國愛港。

為基本法起草指明方向
 記得2004年香港展開政制發展大討論，新華社重新播發了鄧公於1984年的

強世功：鄧公談話適用於解決普選爭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北京報導）30年前的今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時詳細闡釋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內涵，目前發表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白皮書將此收入其中。參與白皮書起草的著名香港問題專家、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強世功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鄧公當年的談話給隨後的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起草指明方向 and 原則。如今，白皮書將有關原則和標準收錄其中，同樣適用於解決當前香港依然爭論不休的特首普選問題。

強世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鄧小平是「一國兩制」的創始人，基本法也是在他的創始下制定而成。鄧公當年《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談話，緣於當時香港各界對什麼人管理香港、管理者採取什麼辦法產生爭吵不休，意見很大。要正確理解「港人治港」、愛國者治港就必須要了解鄧小平談話內容和背景，要從基本法起草的歷史入手。



▲ 強世功

回歸前憂慮與今日同出一轍

強世功介紹說：「在中英談判過程中，香港方面懷疑中央的誠意，提出「三難題」思路，要求中央政府、英國和代表香港意願的香港立法局議員三方共同參與談判。中央堅決反對，因為這意味著將香港類似等同於主權國家，鍾士元是當時香港立法局和行政局議員，香港立法局並非民選的代議政府，而是由港督委任，不代表香港人民。鄧小平當時不同意鍾士元以兩局議員的身份訪京，那次會談，鍾士元只是以個人身份來的。」

「這次談話，鄧小平面對的是有特殊身份的中國人，他們受過西方教育，是親港英政府的人，又是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為此，在談話中，鄧小平着重談的是愛國和「港人治港」的問題。」強世功說：「說到底，在「一國兩制」的問題上，香港人的核心問題是，是不是愛國，是不是相信中央政府貫徹「一國兩制」的誠意，是不是相信中國能夠把香港治理好。」

「當時一些香港工商界人士和中產階級人士不相信中央政府治理下能夠有資本主義的繁榮香港，『主權換治權』在他們中很大市場。」強世功說。為此，鄧小平特別強調：「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國人能管好香港這是老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思想狀態。」「香港過去的繁榮，主要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人幹出來的。中國人的智力不比外國人差，中國人不是低能的，不要總以為只有外國人才幹得好。」

「港人治港」自然就涉及什麼樣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鄧小平說：「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強世功評論說，鄧小平當時對「愛國者」寬泛的定義，「是為了盡最大可能包容香港的主流，即工商界和中產階級人士。」

他指出，白皮書在第五章中將「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單獨成篇，強調「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標準的，這就是鄧小平30年前所強調的，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白皮書將鄧公提出的「愛國者治港」原則再次重申，那是因為當前香港所面臨爭論最激動的焦點問題就是普選問題，如同當年回歸前香港社會所面臨的焦慮一樣，可以說，香港回歸17年以來，香港社會圍繞「治港者」的爭吵一直都沒有得到根本性變化。他說，鄧公當年提出的「愛國者治港」原則同樣適用於當下，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原則。

愛國者治港具有法律依據

強世功強調，此次中央發表白皮書也正出於對香港現實的考慮，解決目前香港社會爭論最激烈的是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白皮書明確提出：「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全 and 發展利益，符合香港實際，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特別是要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規定的規定，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為此，白皮書可以說就是鄧公當年談話，重申了「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並明確表示「愛國者治港也是具有法律依據的」。

10年前新華社重溫鄧公談話正本清源

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談話，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近日公布的白皮書根據鄧公當年的談話，全面準確地闡述了鄧公「一國兩制」的要義。2004年2月，香港開始討論政制發展，反對派挑起了爭議時，新華社播發了鄧公在1984年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談話，強調了「一國兩制」的要義，尤其是愛國者治港的標準，正本清源。當前，香港政制發展面臨關鍵階段，重溫新華社及其《人民日報》的分析，在今天也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2004年2月8日，時任特種政務司司長曾德權與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成員、代表特區政府赴京，與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座談香港2007年政改事宜。2月10日，政制發展專責小組離京，新華社即刊發稿，引述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指出，應當明確，「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高度自治是香港特區在中央授權下實行高度自治。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應與香港特區是直轄於中央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相適應。

特區政制由基本法確定

未來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具體產生辦法，必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循序漸進的原則，有利於鞏固和完善行政主導體制，有利於社會各階層的均衡參與。中央政府在考慮這一問題時，最大的着眼點是要有利於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還明確表示，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予以確定的，在研究上述兩個產生辦法的問題時必須取中央的意見。內地法律專家着重介紹了基本法有關規定的起草背景，並就有關法律問題發表了意見。

在新華社發稿後，其中有關「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高度自治是香港特區在中央授權下實行高度自治，在研究特首及立法會兩個產生辦法的問題時必須聽取中央的意見等，在香港社會引起了熱議。

擁護祖國主權不損港繁榮

《人民日報》在2004年2月20日發表題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保證》的評論文章，指出鄧公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談話中明確指出，「一國兩制」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國家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香港、澳門和台灣實行資本主

義。《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談話，發揮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今天，重溫鄧公30年前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談話，更有重大意義。

參與白皮書起草的著名香港問題專家、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強世功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鄧公當年的談話給隨後的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起草指明方向和原則。如今，白皮書將有關原則和標準收錄其中，重申了「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並明確表示「愛國者治港也是具有法律依據的」，同樣適用於解決當前香港依然爭論不休的特首普選問題。

當年曾參與基本法起草過程的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也指出，白皮書關於「一國兩制」的闡述，完全體現了鄧公《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精神。重溫鄧公當年談話，對港人在政制發展的關鍵時刻，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包括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擁有的主導權和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 1984年6月23日，鄧小平會見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鄧蓮如及劉國偉等。

鄧公談話全文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中國政府為解決香港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方針、政策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多次講過，我國政府決定過我們這麼開明的政策？從資本主義歷史看，從西方國家看，有哪個國家這麼做過？我們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

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國人能管好香港，這是老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思想狀態。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多世紀裡，外國人看不起中國人，侮辱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改變了中國的形象。中國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軍閥，也不是蔣氏父子創造出來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變了中國的形象。凡是中華兒女，不管穿什麼服裝，不管是什麼立場，起碼都有中華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有這種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要有這個信心。香港過去的繁榮，主要是以中國人為為主體的香港人幹出來的。中國人的智力不比外國人差，中國人不是低能的，不要總以為只有外國人才幹得好。要相信我們中國人自己是能幹得好的。所謂香港人沒有信心，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見。目前中英談判的內容還沒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們一旦真正了解了，是會完全有信心。我們對解決香港問題所採取的政策，是國務院總理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的，我們都有信心。香港過去的事，是嚴肅的事。如果在還有個人談心問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政府沒有信任感，那末，其他一切都談不上了。我們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繼續讓外國人統治，否則香港人也是決不會答應的。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不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香港人，還可以聘請外國人當顧問。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到一九九七年還有十三年，從現在起要逐步解決好過渡時期問題。在過渡時期中，一是不要出現大的波動、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榮和穩定；二是要創造條件，使香港人能順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士要為此作出努力。

＊這是鄧小平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的談話要點。

今昔對照

★鄧小平（#）☆白皮書

- ★中國政府為解決香港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方針、政策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多次講過，我國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我們還多次講過，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這也不會改變的。我們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
- ★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近幾年來，中國一直在克服「左」的錯誤，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來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經過五年半，現在已經見效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提出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
- ★我們對香港的政策長期不變，影響不了大陸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目標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大陸開放一些城市，允許一些外資進入，這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比如外資到上海去，當然不是整個上海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深圳也不是，還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目標是社會主義。
-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情況提出來的，而現在已經成為國際上注意的問題了。中國有香港、台灣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何在呢？是社會主義吞掉台灣，還是台灣宣佈的「三民主義」吞掉大陸？誰也不好掉誰。如果和平解決，只有用武力解決，這對各方都是不利的。實現國家統一不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統一的。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世界上一些爭端都面臨着用和平方式解決。
- ★中國的目標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大陸開放一些城市，允許一些外資進入，這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比如外資到上海去，當然不是整個上海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深圳也不是，還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目標是社會主義。
- ★憲法明確規定國家的根本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並規定了國家的基本制度、領導核心和指導思想等制度和原則。堅持一國原則，最根本的是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尊重國家實行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則。……必須在堅持一國原則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國家主

鄧小平談話與白皮書內容對照

策，等等。

★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大陸開放一些城市，允許一些外資進入，這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比如外資到上海去，當然不是整個上海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深圳也不是，還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目標是社會主義。

★憲法明確規定國家的根本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並規定了國家的基本制度、領導核心和指導思想等制度和原則。堅持一國原則，最根本的是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尊重國家實行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則。……必須在堅持一國原則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

（主）鄧小平1984年6月22日、23日發表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談話。

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特別是尊重國家實行的政治體制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則。

★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甚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在「一國兩制」之下，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

（主）鄧小平1984年6月22日、23日發表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談話。

他續說，白皮書重申了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談話精神，及中央對港非有全面管治權，「當已經開明『高度自治』而非『全面自治』。中央擁有香港『高度自治』監督權。先有「一國兩制」後有基本法，有根有據清清楚楚。」

基本法草案諮詢委員會

- ▲譚耀宗
- ▲王敏剛
- ▲劉迺強
- ▲王英偉
- ▲何鍾泰

「一國兩制」方針與白皮書一脈相承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總結了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的實踐。多名曾參與基本法起草過程的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指出，白皮書所載，是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的體現，重溫鄧小平當年《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談話，有助於大家認識「一國兩制」的要義，尤其是在今日政改的關鍵時刻，實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鄧公當年提出「一國兩制」構想高瞻遠矚，在30年前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談話中，已清晰表達了「一國兩制」須以「一國」的社會主義為主體的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指出，白皮書所載，是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的體現，重溫鄧小平當年《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談話，有助於大家認識「一國兩制」的要義，尤其是在今日政改的關鍵時刻，實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鄧公當年提出「一國兩制」構想高瞻遠矚，在30年前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談話中，已清晰表達了「一國兩制」須以「一國」的社會主義為主體的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指出，白皮書所載，是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的體現，重溫鄧小平當年《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談話，有助於大家認識「一國兩制」的要義，尤其是在今日政改的關鍵時刻，實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表示，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全 and 發展利益，符合香港實際，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特別是要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規定的規定，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為此，白皮書可以說就是鄧公當年談話，重申了「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並明確表示「愛國者治港也是具有法律依據的」。

王敏剛：香港權力來源自中央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法法小組組長王敏剛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重溫鄧公當年《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論述，就知道白皮書當中有關「一國兩制」的闡述，反映了鄧公的精神，「一國兩制」並無改變。

他形容，白皮書發表是適逢其時，「現時香港回歸17年，既有內部矛盾，港的外國勢力又由暗變明，擾亂「一國兩制」的運行，白皮書是對外國勢力發出嚴正警告。」

王敏剛直言，香港擁有普及而平等的「權利」，而「權利」來自憲法架構的「權力」，港人須認清香港法律，而「權力來源」，國家是香港主權，為此，從法從理，香港的「權力來源」是源自中央政府。同時，全

王英偉：「兩制」不可凌駕「一國」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王英偉表示，當年，根據鄧公的思想，基本法在起草時已清楚開明「一國兩制」的原則，「兩制」絕不可能凌駕於「一國」。白皮書只是重申了鄧公當年《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談話的精神，包括中國全面管治權，「作為諮詢，我認為為無新意，全國兩制」於此而止。或許，起草基本法至今已20年，港人忘記了起草基本法過程，事實是「一國兩制」於1985至1990年，已不斷反覆討論。

他續說，「一國兩制」最大意義是，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並確保港人生活方式不變，但現在香港好像忘記了「權力來源」。香港並非透過選舉授權，而是中央授權香港擁有高度自治，即賦予了高度自治，就有幾多權。基本法已經對「一國兩制」有全面說明，中央賦予香港是高度民意自治不是全面管治，白皮書是重申權力來源。」

劉迺強：白皮書適時作正確解釋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強調，根據鄧公的精神，基本法在起草時已說明「一國兩制」的最大含義，就是保留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而非外界認為「兩制」是「全面自治」，「平起平坐」根本不存在。而是通過「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保障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不變。

他續說，白皮書主要講述「兩制」內容，包括全面管治權及高度自治監督權，「這是反對者最着意的地方，過去似乎被忽略，白皮書只是於適當的時間發表解釋正確意思。」

何鍾泰：基本法有根有據很清楚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大舜政策研究中心副主席何鍾泰說，他曾參與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見證「一國兩制」誕生。當年，鄧公曾三次會見香港九大專界，吸納香港各界意見，當年就完整詳論了「一國

程介南：質疑白皮書講不通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現為電視時事評論員和政治公關顧問的程介南直言，目前爭論，其實和當年基本法起草的爭議相類，比如「剩餘權力」，「當多次反覆作專題討論，李柱銘可能選擇性忘記，以擷取港人忘記起草年代。」

他強調，鄧小平論述着重談「兩制」分別，白皮書則重「兩制」內容，但前提都是「香港絕對不可能置於國家之外」，白皮書是對「一國兩制」的將來式，而鄧小平的論述是針對「一國兩制」的過去式及過去進行式，兩者並無隔閡。」

程介南並強調，「兩制」是從屬於「一國」主權，不可能將「兩制」割裂於「一國」。「已故英國首相戴卓爾早就向鄧小平提出「主權換治權」，但被鄧小平嚴正駁斥。『主權不可討論。』為此，有人質疑白皮書違背「一國兩制」是講不通的，「相信反對得最大聲的人其實是最明白的。」